

孫中山研究口述史

葉選平

京 津 卷



(下)

◎胡 波 主 編

SUN ZHONGSHAN
YANJIU KOU SHU SHI
JING-JIN JUAN (XIA)

南方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孫中山研究口述史

葉選平



京 津 卷

(下)

◎胡波 主编

SUN ZHONGSHAN
YANJIU KOUSHUSHI
JING-JIN JUAN (XIA)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京津卷 / 胡波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1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

ISBN 978-7-218-10443-0

I. ①孙… II. ①胡…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5215 号

SUN ZHONGSHAN YANJIU KOUHUSHI · JING-JIN JUAN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京津卷

胡波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出版统筹: 柏峰 张贤明

责任编辑: 柏峰 张贤明 林冕

封面设计: 瀚文文化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1.75 字数: 435 千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5.00 元 (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目 录

(下)

张海鹏	001
王学庄	039
曾业英	075
王晓秋	107
盛永华	153
王玉璞	199
虞和平	225
王先明	267
附 录	305
后 记	312



张海鹏

◆

张海鹏（1939— ），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县。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该所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2004年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等，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理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等。

主要著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1998）、《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张海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张海鹏自选集》（学术出版社，2012）、《台湾史稿》（凤凰出版社，2012）、《中国近代通史（1840—1949年）》（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等；《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主编）等工具书与资料集多种。

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等专题研究论文百余篇。

时 间：2013年3月17日

地 点：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者：张海鹏

采访者：胡 波 赵 军

整理者：陈凤娇 张道有

问 张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我们此行前来拜访您，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希望借用您的视角，回顾一百年来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史学会关于孙中山研究的现状以及历史的脉络；第二是请您简单地谈谈今后如何做好孙中山学术研究工作。我们知道，您自196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史所”）一直工作至今。应该说，近代史所承载着您的学术之路，是您的精神家园。首先请您回顾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踏上这条学术之路的？

张 我的学术之路比较复杂，不容易说清楚。

1959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是好的，那时我的兴趣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在四年级作学年论文时，看了《汉书》之后，写了一篇题为《试论秦汉之际的游侠》的文章，当时没有想过去做

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主修唐长孺^①教授的隋唐史，可以说是隋唐史专题班考试分数最高的一位，所以系里指定唐长孺教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给我出了题目《北齐政权的评价》研究。在看书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想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后来花了几个月时间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啃了一遍，这本书很难读，读完以后发现剩下写论文的时间不多了，再回头去看《北齐书》，时间不够了。所以我就跟当时的系主任吴于廑教授反映情况——时间不够，能不能换一种形式。吴于廑教授问我想换什么形式。我说想翻译一篇外文，看能不能拿这篇翻译的外文充当毕业论文。吴于廑教授表示同意。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就从苏联新出版的刊物《近现代史》杂志（1963年第6期）里面指定了一篇论苏美建交三十年的文章，作者是依斯拉爱梁 Исраэлян。我用一周时间翻译完毕，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老师评了5分。系总支书记认为这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需要“消毒”，要我写一篇批判文章。1964年5月，我完成题为《苏美外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毕业论文，大概4万—5万字。随后压缩成2万—3万字，并改题为《试论苏美建交的原因》，寄给了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后

①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代表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书兵志笺正》、《二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的发展》等。

来我知道，编辑部收到了此文，近代史所余绳武、王学庄也看过此文，副所长黎澍似乎也很高兴。当然，此文最终未能发表。但这也成为我后来最早调入西郊组（近代史所），组里希望培养我成为研究中俄（中苏）关系的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理由。

记得，我当时本来打算报考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考试前的一个月，即1964年2月，历史系党总支又推荐我报考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班。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通知，外交部长兼外交学院院长陈毅将在外交学院办两个研究生班，每班30人，为未来外交战线培养外交人才和国际关系方面理论研究人才，他们要在全国重点文科大学中招收学生。外交学院向来具有优先录取权，它的招生也不同于一般的高校招生，不能自由报考，而是将通知发到各个学校的党总支，由党总支推荐。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完全服从分配的，武汉大学党总支推荐我去考。我就放下了思想史，因为那个外交学院研究生班，我也是很愿意去的。在高中和大学这几年，我也注意看一些外交方面的书，后来写苏美建交的文章，也看了一些外交方面的资料。苏联出的《外交大辞典》，我也翻了，知道外交方面最基本的概念和常识。且考大学时，我就想学外文，而进入外交学院研究班，我就有机会学习外文。考过之后，放假我就回家干活了。8月16日，学校统一宣布分配方案，我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武汉大学有四五百人被分配到北京，学校

包了一列火车把我们送到北京。8月18日，我就到北京了，没有机会到系里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当时因为是学生，到达北京时身上也没什么钱，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幸好学部派人到火车站接，叫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所里。

到所里以后，正好碰到北京召开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文、理、工、农、医各科都有，邀请了国外多位科学家参加。我当时和郭永才^①同一天到所里，通知我们到这个会上去做会务工作。开完会以后，我回到所里，我们当时的人事科科长是一位女同志，她跟我讲，把你弄到所里来，那是多么不容易。

问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 原来，1962年开始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即中苏论战。1963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代表大会，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扬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会议提出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反修”的任务，当时在报纸上不会公开讲，但内部是这样布置的。

当时近代史所所长是范文澜，副所长是黎澍，常务副所长是刘大年。黎澍同志负责管理人事工作，他认为：

^① 郭永才（1940— ），辽宁大连人。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

近代史所应该建立一支“反修”的队伍，但不应该让上了年纪的人再从事“反修”的工作，应该从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所里当时派了五路人马——中南一支，东北一支，华北一支，西南一支，西北一支，拿着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到各个地方的大学文科各系挑人。中南一线是派何重仁^①去挑。他到武大时，历史系就把我推荐给他。但是我不知道，系里没有告诉我。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我既被外交学院录取了，又被近代史所挑中了。经过所里多次与外交学院交涉，最后外交学院放弃了，所里就把我挑过来了。

问 您是在1964年进入近代史所，但是在那个时代进所后能够进行学术研究吗？

张 1964年8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49年来，我一直在近代史所工作，没有换过任何单位，这或许是我唯一感觉到遗憾的地方。当年，我被分配到近代史所工作，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78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学术研究工作，中间有长达13年的时间没有从事任何学术研究。

① 何重仁（1923—1992），湖南沅陵人。曾任《历史研究》三人小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组组长、近代史组组长及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代表作有《中国史稿》（第四册，合著）等。

我到所里报到后，很快就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叫“四清运动”。被分配到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我们的工作，按照“桃园经验”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一落实。“访贫问苦”一个月左右，没有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1965年5月，我们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时，当地干部群众都来欢送我们，似乎有点难舍难分。我记得在甘肃张掖的8个月里，我们每天都到当地百姓家里吃饭，每天吃的都是当地很普遍的用醋或者香油拌一下的红辣椒面，从来没有见过蔬菜，更谈不上鸡鸭鱼肉，应该说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我出生、成长在湖北，不太了解北方，更不了解西北，这8个月对于我了解中国西北的农村，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国家规定，大学毕业后应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我们在张掖8个月，还不到1年，学部领导体恤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张掖太艰苦了，就给我们换了一个地方。1965年6月中旬，我到山东黄县（今山东烟台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下孟家生产队一户孟姓农民家里。当时有个在全国是仅次于大寨大队的农村基层单位，非常有名。我们当时所在的生产队在山区，没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种果树，主产梨。我们在山上与农民一同劳动了7个月，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1948年淮海战役，黄县各村里的农民，男子人人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后来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我们在黄县农村有了比较切身的感受。

在黄县进行7个月的劳动锻炼后，我就回到近代史所，黎澍同志安排我到西郊组，在当初进所的30—40人中，我是最早被安排到西郊组的。

问 您在西郊组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张 西郊组是1963年建立的，对外名称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由黎澍同志领导，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金应熙^①担任组长，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李龙牧^②任副组长。同时黎澍又从全国各地招聘了一批年轻学者，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近代史研究所的成员。

西郊组的活动对外是保密的。这个组的任务，已经不是做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工作，而是为外交部的中苏谈判准备两国边界问题资料。西郊组的负责人想培养我成为研究中苏（中俄）关系的学者，组里专门安排金应熙教授单独给我上中俄边界历史的课，他主要讲中俄边界的西段历史（东段大家已经比较清楚了）。实际上，我

① 金应熙（1919—1991），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工人运动史、东南亚史、思想史、香港史等。代表作有《金应熙史学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纲》等。

② 李龙牧（1918—1996），北京人。曾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系副主任，上海市编辑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共产主义在实践中》、《五四时期思想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

在西郊组除了学习中俄关系历史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管理西郊组的藏书。西郊组的藏书，是1962—1963年余绳武等人从武汉、上海、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图书馆找来的，这些藏书基本上全是俄文和英文，尤其是19世纪末以来，东北各地出版了大量的俄文书，同时又从俄罗斯运来了大量的藏书，这些藏书今天还在近代史所。最初这些藏书束之高阁，很多书都没有上架，也没有编目录。我到了西郊组之后，就对它们进行编辑、分类、排架。很快，“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问 您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怎样的经历？

张 1965年11月，我们在黄县县城作劳动锻炼总结时，就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回到北京以后，黎澍同志让我写批判吴晗的文章。当时批判吴晗，从黎澍的心里来讲，也是一种学术批判。他给我布置了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花了一个月，写好了给他看，他对我的文章可能不满意，对我说还是去读书吧，多读点书。实际上，那时对吴晗的批判已转向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做不下去了。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受到的压力非常大。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单位的造反派是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起来造反的。1966年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人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夺资产阶级霸占

的史学阵地》社论，配发了史绍宾的文章，点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史料，包庇吴晗，社论批评的矛头直接针对近代史所。

学部通知6月4日要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学部大会，批判杨述^①的《青春漫语》。近代史所挑选了我到学部大会上发言。1966年6月4日，学部批判杨述大会在首都剧场举行。学部部分党组成员（包括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以及刘大年等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按照大会安排，我是第四个发言。当时近代史所所长虽然是范文澜，副所长是刘大年、黎澍，但实际上日常工作并不由范文澜管理，而且“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保护了范文澜，不让贴大字报，而刘大年同志长期主持近代史所工作，且兼任近代史所领导小组组长。我在批判了杨述《青春漫语》后，在结语里结合“六三社论”对刘大年提出了质询，表示响应社论，彻底打倒盘踞史学界的资产阶级的“东霸天”、“西霸天”，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我想，这次大会应该是我们学部“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6月15日，近代史所党支部召开全所大会，布置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上午，部分党支部、团支委和部分

① 杨述（1913—1980），江苏淮安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常委、《中国青年报》总编。1979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

青年党员商讨今天大会召开问题，主要是由谁来主持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民主选举一个临时的大会主席团。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张德信、郭永才、余绳武、蒋大椿和我组成的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我为大会主席，并主持大会。我就临时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讲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过。这应该是近代史所第一次公开批判刘大年、黎澍，近代史所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1968年2月，我被迫结束近代史所的工作。1968年12月，中央向学部 and 所属各所派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1969年上半年，工、军宣队在所内做团结工作，消除派性，我清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检讨并反思；下半年在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成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1970年1月，我在工宣队的押解下被送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塘坡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近三年，备尝艰辛，心理和政治压力几乎难以承受。1972年7月，随学部“五七干校”一起回到北京。但回到所里后，我依然在监督下从事劳动。直到1974年12月，才解除对我的审查。从1969年的9月开始一直到1974年12月，在长达五六年的艰难岁月中，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完全不自由或者半不自由的情况下，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这是我此生最痛苦、最无奈、最无助、最迷茫的时期。直到1974年12月，工宣队和军宣队才召开全所大会，正式宣布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性路线错误，不记入

档案，免于处分”，解除对我的审查。审查结论一开始有份口头的文件在大会宣布，后来还在所里广播。

问 张老师，1964年您到了近代史所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从事独立的学术科研活动。根据资料显示，一直到1976年，您才发表第一篇专业性的学术论文《李秀成——修正主义和投降派的一面镜子》，我们想知道，当您真正开始走上专业的学术之路以后，为什么把眼光放在近代史研究这一领域？

张 1975年上半年，刘大年正在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意愿修改《中国史稿》，他希望我参与进去。后来，近代史组何重仁与龙盛运^①两位同志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到近代史组来。他们在谈话中流露出是刘大年同志要我去近代史组。我很感动，没有多想，就在1975年9月去了近代史组（经过军宣队批准）。近代史组当时的负责人是刘桂生、钱宏^②、何重仁三位同志。近代史组正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评《水浒》”，当时讨论的结论是，要结合

① 龙盛运（1929— ），湖南衡阳人。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 and 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太平天国史、湘军史。代表作有《太平天国运动史》（合著）、《湘军史稿》、《清代全史》（第七卷，主编）、《向荣时期江南大营研究》等。

② 钱宏（1921—1992），原名钱念杞，江苏吴江人。曾任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组长、近代政治史研究室主任、《近代史研究》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萌芽》、《中国史稿》（第四册，合著）、《中国近代史》（1—3册，合著）等。